

荆史新探

诗人杜甫江陵成“圣”

□ 张卫平

“诗圣”杜甫名震诗坛,无人不知。然而,杜甫生前,不仅不“圣”,活得还极其狼狈艰辛。虽然,他曾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,但那也只是挂了个虚衔。他留给这个世界的,是贫穷、是病愁、是漂泊。当然,还有那些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。但是,这位伟大的诗人,直到他去世43年后,才被人用一篇墓志铭推上诗歌的神坛。撰写这篇铭文的人,是被贬到江陵的元稹。

这,不是演义,是信史。
公元813年,杜甫的孙子杜嗣业,将祖父的灵柩从湖南耒阳迁回河南偃师。当杜嗣业沿江北上,途经荆州时,突发奇想,找到了时任江陵士曹参军诗人元稹,请他为祖父撰写墓志铭。于是,这个同样“悲惨”的元稹,写下了那篇著名的、将杜甫抬上“诗圣”宝座的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。

古代墓志铭,就相当于现在追悼会上的悼词。元稹在这篇墓志铭里,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杜甫诗歌的“集大成”特征,即古体、近体、乐府、歌行,无所不工。最为重要的,是这句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判词:“诗人以来,未有如子美者。”这句话,翻译成白话文,就是:从古至今,没有一个诗人能比得上杜甫。在当时,这个“顶流”的评价,是相当“出格”的。盛唐至中唐,诗坛公认的“顶流”是李白。韩愈曾说,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,也只是将两人并列,未分高下。而元稹,则直接推杜甫为第一,把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等,全都比了下去。此举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大地震。

元稹当时34岁,刚刚被贬到江陵,官职低微,心情低落。他素有文名,早年与白居易共同提倡“新乐府”,并称“元白”,诗作号为“元和体”,并首创了次韵诗。由元稹为杜甫“定调”,还是说得过去的。更何况,这篇墓志铭,是杜嗣业千里请托而来,并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,而是后辈对前辈的真诚致敬。

当然,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巧合,杜甫也曾任江陵生活过。

杜甫的江陵之行,始于一场温热的期盼。他在蜀居夔州近两年间,贫病交加,后应胞弟杜观数次书信相请,便携家人登舟,赶赴荆州。

初到江陵时,亲友相迎,湖亭泛舟、宴饮赋诗,那短暂的温情,让诗人几乎忘了漂泊的苦楚。他陪幕府友人泛舟江上,看春水漫堤、燕雀衔泥;他踏入弟弟的庭院,看雨打梨花、庭树生荫,在《乘雨人行军六弟宅》里写下温柔的景致,暂得片刻人间烟火。

“羁旅知交态,淹留见俗情。”然而,给予杜甫美好憧憬的楚国故都,终究容不下一个落魄的老诗人,其美好的憧憬最终化为了泡影。56岁的他,只有带着屈辱与悲凉,在荆南漂泊。

“囊空恐羞涩,留得一钱看”,荆州的秋风寒意,浸透了杜甫单薄的衣衫,也凉

透了诗人的心。寄人篱下的杜甫,处处小心,“结舌防谗柄,探肠有祸胎”。为了谋生,他只得走街串巷,去叫卖一种用米浆与豆腐做成的小圆子。后来,杜甫的创意,成就了荆州名小吃“豆腐圆子”。他住过的巷子,也被命名为“杜工部巷”,沙市人称之为“杜甫巷”。

千百年来,荆州的民众不一定记得诗人的诗,但记得杜甫吃过的苦、住过的巷子、传下来的小吃。聪明的荆州人,用一条巷子和一道小吃来纪念杜甫。

当然,真正让杜甫诗人走向“诗圣”的,不是豆腐圆子,而是他在荆南漂泊岁月中写下的那些大气磅礴、悲而能壮的不朽诗篇。在这里,他迎来了晚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。有学者统计,杜甫在荆南期间存诗50多首,其中多篇堪称其晚年诗风的典范之作。这些诗篇,将一己之漂泊,升华为对天地、历史、苍生的深沉凝视,实现了境界、立意、内涵的三重飞跃。

“江汉思归客,乾坤一腐儒。”杜甫在《江汉》中写道:“片云天共远,永夜月同孤。落日心犹壮,秋风病欲苏。古来存老马,不必取长途。”杜甫身在江汉之间,却心系故土,自嘲为“乾坤一腐儒”,这是何等胸襟!“落日”而“心犹壮”,“秋风”而“病欲苏”,衰病之身而不灭之志,悲凉中勃发出雄健的生命力。悲而能壮,衰而不颓,苍凉中自有一股郁勃之气,成为杜甫晚年特有的诗歌美学。

在《地隅》中,杜甫以屈原、王粲自况,将个人的流离失所与家国的丧乱动荡融为一体。“江汉山重阻,风云地一隅。年年非故国,处处是穷途。丧乱秦公子,悲凉楚大夫。”他在诗中用“年年”与“处处”四字,写尽自己漂泊的无所依凭与穷途末路的困厄之情,却又在“秦公子”“楚大夫”的历史回响中,获得一种超越个人命运的厚重感。

而在《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》这首长篇排律中,杜甫更是将荆南生活的困苦与内心的感慨一泻而出:“苦拙求食尾,常曝报恩腮。结舌防谗柄,探肠有祸胎。苍茫步兵哭,展转仲哀……饥藉家家米,愁微处处杯。”诗人用“结舌防谗柄,探肠有祸胎”十个字,写尽寄人篱下的战战兢兢;“饥藉家家米,愁微处处杯”,则将笔触触透的窘迫生活,写得沉痛而不失风骨,表达了在苦难中不曾倒下的尊严。

当穷困潦倒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江陵,乘舟南下时,写下了那首苍茫万状的《舟出陵南浦奉寄郑少尹》。“更欲投何处,飘然去此都。”是对前路的茫然,更是对命运的不屈追问:“形骸元土木,舟楫复江湖”,肉身不过土木,命运不过江湖,写尽一个老病诗人对生命的透彻了悟与不甘沉沦。全诗抑郁顿挫,苍凉中见浩荡,是杜甫离荆之作中的绝唱。

“雄都元壮丽,望幸欽威神。地利西通蜀,天文北照秦。风烟含越鸟,舟楫控

吴人。”这首气象雄阔的《江陵望幸》,则饱含着杜甫对江陵这座战略要地的深刻认知。他以“雄都壮丽”落笔,以“西通蜀”“北照秦”“控吴人”展开了一幅江山形胜的宏图景象,地理的雄浑与历史的厚重交织其中,展现了杜甫将个人漂泊体验融于历史叙事的典型特征。

说到这里,就不能不提《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》,诗中名句“曾闻宋玉宅,每欲到荆州”,将杜甫对荆州的向往与留恋凝于十个字中,不但成为后人追怀杜甫荆南岁月时最常引用的佳句,还被今人改写成“闻听三国事,每欲到荆州”的宣传语。

杜甫在江陵写下的诗篇,不仅只是对个人漂泊的单纯哀叹,而是在荆楚大地的苍茫气象中淬炼出的生命绝唱。“落日心犹壮”之雄健,“江汉山重阻”之沉郁,“雄都元壮丽”之雄浑,“更欲投何处”之苍茫……这一切,都是大的、重的、深的。雄浑而不失劲健,深沉而不失苍凉勃郁。这些正是杜甫晚年诗风的巅峰状态,也正是元稹在江陵撰写那篇墓志铭时所敏锐捕捉到的“尽得古今之体势”。

无疑,元稹看到的,正是这一点。他在墓志铭中写道:“属天下兵乱,所在地方,子美避乱奔走,寓于荆楚之地。”他知道,杜甫在荆楚漂泊过。他自己,不正正处于荆楚贬谪之中,多少有些同病相怜。但更重要的是,他敏锐的文学眼光精准地捕捉到杜甫诗歌的“集大成”性质:李白长于古风,短于律诗;王维长于山水,短于社会关怀;高适、岑参长于边塞,题材相对单一。唯独杜甫,什么体式都能写到极致,而且把诗歌从个人抒怀,扩展到家国天下,“尽得古今之体势”;这七个字,精准无比。

当然,元稹的墓志铭只是第一步。杜甫“诗圣”地位的确立,又经晚唐的跟进,到宋代达到高潮。苏轼说,“古今诗人推杜甫为第一”;黄庭坚等人,则奉杜甫为江西诗派始祖。到了明清,“诗圣”之称正式固定。但是,所有这一切的起点,都可以追溯到公元813年诞生于江陵城中那篇不一样的墓志铭。

今天去沙市,杜工部巷还在,豆腐圆子还能吃到。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记忆!荆州人不仅记住了他的诗,更是记住了他这个不一样的人。

元稹用一篇墓志铭,让杜甫不朽于中国文学史;沙市老百姓,用一碗豆腐圆子,记住了作为“人”的杜甫。哪一种更贴近杜甫的本意?我觉得,恐怕是后者。因为杜甫一生最在意的,从来不是自己能不能当“诗圣”,而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而江陵,正让杜甫在荆南漂泊中,写下“落日心犹壮”“形骸元土木”“更欲投何处”等壮阔诗篇,让元稹写下划时代墓志铭,孕育一代“诗圣”的风水宝地!

从这一意义上来看,我们完全可以说:江陵,成就了杜甫!

简说楚文化⑬



第六节 建筑园林

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,主要建筑形式包括宫殿、宗庙、公府、馆榭、地下宫室、坛、祠、舞台、观景楼阁等,丰富多样,各具其趣。

楚国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,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。楚国建筑以木构建筑为主,采用悬山顶、斗拱等技艺,独具特色。楚国还注重城市规划,城市布局严谨、有序。楚国的建筑雄伟壮观,依山傍水,景物相融,被现代学者认为“从理论到技艺都已形成独具特色之体系,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”。

楚人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杰出成就,楚都纪南城堪称典范。纪南城地处江汉平原西部边缘,西北为荆山余脉八岭山和纪山,因位于纪山之南而得名。考古资料显示,纪南城东西长约4550米,南北宽约3588米,城墙为夯土筑成,周长15506米,城内总面积约16.6平方公里,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都城遗址。

考古工作者现已探明纪南城有城门7处,其中水门2处。城内宫殿区、手工业作坊区、居住区等布局清晰。从考古勘探出的夯土台基的数量与分布来看,楚王宫布局严谨,规模宏大,排列有序。高低不同的建筑,建在层层的高台之上,形成层台累榭、错落有致的楚国宫殿建筑特色。屈原在《招魂》中写道:“高堂邃宇,层檐轩些。层台累榭,临高且些。网户朱缀,刻方连些。冬有突夏,夏室寒些。”这些诗句是对纪南城宫殿的写照。

考古发掘资料同时显示,仅在纪南城龙桥河西段长约1000米,宽约60米的范围内,就发现古水井256口,加上后来引江济汉工程发掘的水井,纪南城内外水井数量超过500口。此外,纪南城四周还分布着大量坟墓,有封土的墓葬数量在600座左右,没有封土的则不计其数。如邻近纪南城东城垣的雨台山,密集分布着为众多的平民墓葬,测算总数应在10万座以上。

城内水井和城外墓葬的数量、规模与分布范围,直观反映了纪南城的人口数量。有学者根据城内水井、墓葬的发掘数量推算,当时郢都的人口可能达到30万。

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繁荣富庶的大都会,其拥挤程度不难想象。东汉文学家桓谭《新论》写道:“车毂击,民肩摩,市路相排突,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。”作者用生动的笔触,为我们描述了昔日的情景:楚国的郢都,车水马龙,热闹非凡,达官贵人坐着马车在城市里穿行,不时传来车轮碰撞的声音,街上人挤人,一不小心就会碰在一起,早上穿着新衣服出门,晚上回去竟被磨得又破又旧。因此,民间也称纪南城为“挤烂城”。

楚都纪南城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南方地区面积最大、古城垣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都城遗址。春秋战国时期,楚人以纪南城为都城,成功跻身“春秋五霸”“战国七雄”之列,不仅成就了辉煌的霸业,也创造了可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灿烂文化。

在普通民用建筑方面,干栏式建筑在楚地独树一帜,其特点为一楼架空,二楼居住,以竹木结构为主。干栏式建筑是楚国民间的主要建筑形式,这种民居建筑式样在我国南方的土家族、苗族居住地区仍然沿用。干栏式建筑也是古代中国南方建筑文化的主体,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,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

在园林建筑方面,楚国章华台是我国离宫建筑和园林建筑的鼻祖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台”。据记载,楚国历代君王都好筑台,都曾广建宫庭园林,修建了大量的离宫、苑囿,如渚宫、强台、鞠居台、五台、层台、钓台、小曲台、五乐台、九重台、荆台、章华台、乾溪台、新台、阳云台、兰台宫等。其中以章华台最为著名。

公元前540年,楚灵王即位,立即着手修筑章华台。好大喜功的楚灵王比起好筑高台的楚国先君,有过之而无不及,为了炫耀国力,威镇诸侯,他决意“穷土木之技,单珍府之实”,举全国之力,在云梦泽修建一座宏伟宫苑,以豪华富丽夸耀于诸侯。到公元前535年,历经6载,消耗无数,一个占地方圆四十里,以章华台为主体的22个宫殿建筑群拔地而起,气势雄伟,蔚为壮观,享誉天下。

章华台落成,楚灵王兴奋不已,但凡到楚国访问的国君和使者,楚灵王都邀请他们登临章华台,感受泱泱大国气象。就连处于偏远北方、名不经传的狄国使者访楚时,也在章华台上受到了楚灵王的热情款待。章华台四周曲栏环绕,连绵十余里,宫阙巍峨,拾级而上,非常消耗体力,以致这位狄国使者在登临章华台时,体力不支,中途休息了三次才登上台顶,这也是章华台又名三休台的来历。

1986年,处于江汉平原腹地故楚国中心区的湖北潜江龙湾遗址被发现,立即震动了学术界,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众多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后,有专家认为此遗址即楚灵王修建的章华台(宫)。龙湾遗址呈长方形,东西长2千米,南北宽1千米,总面积达2.4万平方米。遗址的东部有连成一线的四个台,其中最高的一号台,俗名“放鹰台”。根据已暴露的遗迹和勘探提供的情况,初步推测潜江龙湾放鹰台一号台宫址的台基东部为三层台建筑(系宫殿主体建筑,其朝向为坐北朝南);西部为二层台建筑;台地平坦,似为广场式建筑;台北、台东为亭廊环绕的园林式建筑。台周曲廊环绕,台内曲径穿梭于一、二、三层之间,台东有大河奔流,台西、北有湖水漾波。整体布局充分利用了高冈、湖泊等地理环境,自然景观与人工建筑浑然一体。

(未完待续)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三十期 总第二百二十一期
荆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⑬

心灯相传:从濂溪太极到三袁性灵

——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

□ 周崇典

华夏文明千年奔涌,儒学如砥柱立波,承载民族精神基因。理学与心学的传承,似一条温润坚韧的红线,串联起从北宋到明末的千年哲思。让我们沿历史长河溯源,以“旅程站点”之法,梳理这条思想脉络,读懂千年薪火相传。

第一站:濂溪先生·周敦颐——理学

我们旅程的第一站,是北宋的濂溪先生——周敦颐。北宋的风,吹醒了儒学的新生机,周敦颐就是那播火之人,也是理学的开山鼻祖,被后世尊为“濂溪先生”。可以说,他是为理学立了“魂”——这里的“理”,通俗来讲,就是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,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底线与行为准则,简单说,就是世间万事万物都要遵循的“规矩”。他接过韩愈等人复兴儒学的火炬,不满足于儒家伦理的表层阐释,而是把儒家的伦理哲学化,提出了“无极而太极”的宇宙本体论,以此阐释“理”的本源。他那篇家喻户晓的《爱莲说》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咏叹,不仅是写莲花,更是他人格理想的写照,也是理学精神的最初萌芽。他的思想如同一颗种子,为后世理学的发展确立了清晰方向,而程颢、程颐兄弟拜师其门下,便成了承接这颗种子的第一人。

第二站:洛学正传·“二程”——承前

启后,奠定理学框架
承接周敦颐思想火种,我们至第二站——二程兄弟,洛学正传。二程在洛阳讲学创“洛学”,将“理”推至前台,明确“天理”为宇宙万物本源与人类社会最高

准则。二人同出一门却风格迥异:程颢如春风,倡“定性”,教人静察内心平和;程颐似秋霜,讲“敬义”,劝人坚守道义合礼。他们共同奠定理学基本框架,让思想脉络正式成型。

第三站:心学滥觞·陆九渊——另辟

蹊径,转向向内求心
二程思想传至南宋,陆九渊另辟蹊径。他嫌二程学问过于繁琐,振聋发聩提出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,将求理重心从“向外求索”转为“向内安顿”,开启心学先河。他强调“发明本心”,认为真理在己心,无需向外苦寻。这一思想转向,是理学脉络的重大分流与升华,为心学发展铺就道路。

第四站:心学大成·王阳明——致良

知行合一,焕发生机
时光前行,我们抵达第四站——明代王阳明,心学集大成者。承接陆九渊心学先河,经百年沉淀,思想火种在王阳明手中迎来巅峰。他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于一身,创立“阳明心学”,提出“致良知”与“知行合一”核心观点:人人皆有先天良知,修行在于唤醒;知与行不可分离,道理需落实行动。其学说打破程朱理学僵化教条,让理学从书斋考据变为普通人可行行的生活准则,成为理学脉络中最具生命力的璀璨一环。

第五站:性灵之火·公安三袁——化理

为文,融于世俗烟火
王阳明心学传至明末,影响深远。思想家李贽以“童心说”振聋发聩,主张真心、真情、真我,反对虚伪礼教与僵化

文风,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新之气。公安三袁正是李贽思想的忠实继承者,他们将心学与童心说熔于一炉,高举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旗帜,主张为文要发自肺腑,不事雕琢。袁宏道“情之所至,诗无不至”,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。他们把严肃的理学思辨,化作追求真情、自由与个性的文学新风,让千年思想脉络,最终落在人间烟火与真实性之上。

千年旅程落幕,思想薪火从未熄灭。这条脉络,从周敦颐开山立理,到二程承续定框,再到陆九渊转向开派、王阳明集大成,经李贽“童心说”承转启合,终至公安三袁化理为文,实现从宇宙本体到内心良知,再到真情流露的完整传承。理学重“守理”,心学重“本心”,二者一脉相承,丰富儒学内涵,滋养华夏心灵。

思想之伟大,在于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这场千年精神接力,从北宋到明末,从哲人书斋到文人笔端,从宇宙思辨到生活实践,薪火代代皆焕新彩。它昭示着,中国文化的魅力,在于一脉相承的坚守与创新,让古老哲思照亮当代人心。

身处喧嚣尘世,我们或有迷茫,周敦颐的纯粹、二程的守理、陆九渊的向内、王阳明的践行、公安三袁的真诚,皆能确定我们前行方向。守好心中之“理”,安放本真之“心”,不因浮躁、不违本心,便是对千年薪火最朴素珍贵的传承,亦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。

翰墨荆楚⑬



山水写生。
(作者 李小白)